

道德與公民教育



東亞經驗與前瞻

劉國強、李瑞全 編



教育研究系列

道德與公民教育

東亞經驗與前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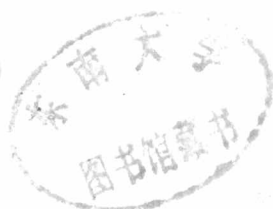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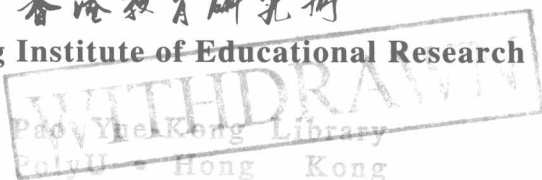
劉國強、李瑞全 編

D731.04
1



香港教育研究所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LC
315
·E18
T36
1996

©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 1996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所有。除獲香港教育研究所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書名：道德與公民教育：東亞經驗與前瞻

編者：劉國強、李瑞全

執行編輯：王建慧

封面設計：王建慧

版面設計：Townpress Limited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

香港 新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學何添樓

電話：(852) 2609 6999 / (852) 2609 6929

圖文傳真：(852) 2603 6850

植字：鮑思高印刷有限公司

承印：御印堂

版次：1996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1000本

I S B N : 962 - 8077 - 04 - X

封面插圖：陳餘生《愛瑪莉的窗子》

前 言

本書輯錄了論文十五篇，其中大部分是各作者於1993年末參加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舉辦的「道德與公民教育國際研討會」所宣讀的論文。出版本書的目的不在於純粹作為會議論文紀錄，各篇論文皆經作者多番修訂，對東亞地區中國、台灣、香港和日本的公民教育，尤其在道德教育方面，提供了廣闊視野和深度的反省。

本書能夠出版，首先要多謝各作者願意提供大作，也須多謝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的支持。在九三年末「道德與公民教育國際研討會」召開後，由於一段時間內缺乏經費，出版計劃只好擱置。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長盧乃桂博士為出版經費費心，副所長曾榮光博士為出版上的行政事宜盡心，在這裏謹表達謝意。更要特別多謝王建慧女士，她編輯的專業、仔細和認真的校對，對本書的出版，居功不少。

1996年7月7日

導 言

劉國強

自七十年代開始，東亞地區的日本及亞洲四小龍—南韓、台灣、新加坡、香港—經濟飛躍發展。七十年代末中國開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經濟也跟著急速發展，使東亞地區自八十年代迄今成為全球經濟發展最迅速的地區。東亞地區在進入二十世紀後，已經歷著歷史上政治上的巨大轉變，君主專制崩潰，「子民式」的政治式微，「公民主」的民主政治逐漸抬頭。近二十年經濟發展，帶來了社會生活的急劇變化，傳統農業社會的人倫道德價值受到了經濟及商業文明的物質主義、享樂主義的不斷衝擊。面對這樣的新環境，如何通過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培養良好的公民，以幫助解決社會、政治、經濟在急劇轉變中所衍生的種種問題，是東亞地區各個政府與教育家所面對的迫切課題。

本書收錄了十五篇論文，既有從理念上反省中國的道德教育傳統，也有從實踐經驗上評述中國、台灣、香港、日本在推行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實況，更有從語言、人性論、兒童心理發展、宗教及道德決策上的不同角度對道德教育的效果與展望作理論性的反省。本書的論文基本上面向東亞的文化與社會，對公民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提供了廣闊視野和深度的反省與檢討。

本書的十五篇論文，根據內容，大約可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了《新世紀的道德教育—從記號學的觀點看道德教育的形式與內容》、《動態倫理決策觀下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及其人性論基礎》三篇論文，是

從新時代以較宏觀的角度對道德教育作出反省與展望。何秀煌先生把語言區分為「大語言」(一般慣常用的日常語言)與「小語言」。道德的小語言與知識的小語言具有不同的性質，不應以知識的小語言抹殺了道德的小語言。了解了語言的區分可以打破哲學上事實與價值的對立。何先生強調，教育的目的在於開拓人的記號體系，也即發展人的意義空間。而開拓道德的意義空間，不是孤立單獨發展，必須參照其他的小語言，尤其是與道德語言有直接、間接緊密關係的知識語言、感性語言與藝術語言。所以檢討道德教育也同時須檢討我們的知性教育、感性教育和藝術教育。何先生認為，「道德的建設從感情的培養開始」，以達於文化人性的成全。

文思慧先生認為根據傳統的進路，在作倫理決策時會面對不少困難，可以是因為所根據的抽象普遍原則常有歧義，或應用決策模型時也產生不同的闡釋。為解決這種傳統進路所帶來的倫理決策之困難，文先生主張倫理決策不應是靜態一次過的事情，而是動態的在不斷自我反省、重新闡釋與評估有關的道德問題下的一連續過程中作出的，因此道德教育應著重在學習與自我發展的培養。

劉國強先生指出面對當前道德教育之重大困難，反省道德教育與人性論的關係是重要的。作為道德教育的人性論基礎，必須是既能肯定人的道德主體的自主與自由，同時肯定人能向上超越以達於更普遍之道或理的一種人性論。儒家與科爾伯格都肯定了這樣的一種人性論，更符合於道德教育的意義。

本書的第二部分包括了《品德形成實驗研究探賾》及《學齡前後期兒童的道德認知與道德情緒的關係》兩篇論文，都是根據一些實驗的結果，從兒童心理發展與道德教育的關係作出反思。

章志光先生根據中國大陸三十年來的實驗研究結果，發現品德的形成是依於內外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而內化了的價值取向對決定品德發展與水平有關鍵作用。在道德教育的方法上，章先生的結論是：單純的說教式的教育效果最差，而具有針對性的教育活動，如針對品德系統作分析或對其中某些要素開展討論，效果便相當明顯。章先生還指出，探明品德形成的心理結構，對應用何種德育方式和方法以推行有效

的道德教育有重要啟示。

鄭欣宜、程小危二位先生在扼要闡述心理學家對道德發展道德情緒的不同理論後，透過兩個不同的實驗研究以探討道德情緒與道德認知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明確顯示，學齡前後兒童在認知上對「不能偷」這些道德規範能明白其必須存在的理由，說明這一規範並非完全是外鑠的，然而有至少三分一的兒童對於當這些道德規範與他們一己願望（想偷且偷到）衝突時，他們的道德情緒的反應是「後果取向」的，此即說明了不少兒童的道德認知與道德情緒的表現並不一致。因此推行道德教育須了解到哪些因素影響道德情緒的產生，這是很重要的，因為道德情緒是引發道德價值、道德行為內在化的動力泉源。

本書的第三部分包括了《中國古代道德教育傳統概述》、《王龍溪哲學與道德教育》、《儒家道德思想對現代公民教育的啟示》及《儒家倫理學與德育的重點》四篇論文，內容主要是對儒家傳統的道德教育作出反省，以見出其在今日仍具價值之處。

黃濟先生清楚的綜述了中國傳統的道德教育。一個人一生的生成，自胎教開始，經歷了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到成人的修養教育，在在顯示了儒家道德教育傳統的豐富內容，不僅可以作為今天中國推行道德教育的一份「優秀遺產」，也是「世界文明寶庫中的一份有價值的財富」。

楊祖漢先生集中從明大儒王龍溪的哲學之反省，以點出道德教育的核心在豁醒興發人的道德意識，使人能時時「致良知」，及其至於更高的聖人境界，則須超越道德忘記道德。

蘇新鋆先生認為儒家道德思想對現代公民教育至少具有四點重要啟示，即：（一）培養道德心，使能產生道德感以有道德；（二）培養認知心，使能有正確的知識以引出道德心的道德意識，並完成道德心意欲完成的道德行為；（三）加強遵守法紀觀念的灌輸；（四）增益奮求義利思想的教導。現代的公民教育如能吸取儒家這些啟示，確能有針砭現代社會之弊病，以收正本清源之效。

黃慧英先生申論儒家倫理學說，指出其睿見在肯定了人的知善知惡、為善去惡、好善惡惡的能力，為道德內在論建立了理論基礎，並解決了「為何道德？」的重大道德哲學問題。然儒家承認上述的道德能力是

需要發展與培育，以達於意志的純化。道德的教育應以啟導感通的能力為重點。感通並非單純是一種感情，而是意志的純粹狀態。教導兒童道德規範雖然有需要，在儒家看來也只是屬於第二序的。

本書第四部分包括了《中共理想人格的塑造：論「英雄模範」雷鋒》、《中國改革開放形勢下價值觀的衝突與道德教育》、《德育在台灣國民中小學的實踐與評鑑》、《香港公民教育的回顧與前瞻》、《天主教學校在多元化社會中推行道德與公民教育的困局及出路》，以及《日本的道德教育》六篇論文，內容圍繞東亞國家及地區——中國、台灣、香港、日本——在實施道德及公民教育的經驗反省與前瞻。

張慧真、盧乃桂二先生析述中共英雄模範雷鋒的生平和他所受正面反面人物之影響，以展示中國官方四十多年來所塑造的理想人格的特質——崇拜領袖、對黨忠誠、羣眾至上、為公忘私、生活刻苦、勤奮自勵。這種以塑造理想人格作為社會英雄模範方式的公民道德教育，往往隨著中共政權的被認受性的起落而起落。1989年「六四」事件後，官方再次全面展開學雷鋒運動，社會羣眾的反應卻冷淡，成效不大。

陸有銓先生根據國內不少調查，幾乎一致顯示了中國在改革開放形勢下，青少年人的價值觀發生了激烈的變化，傳統價值觀受到衝擊而產生矛盾。陸先生認為不應把這些矛盾只看成是教育危機，因為教育具有超前性的功能，教育的作用不只在使青少年「適應」、「接受」既有價值觀，更幫助學生認識自己，理解人的生活，以建構具時代感的價值觀，使新、舊價值觀的發展達到平衡，例如調整社會整體與個人主體間之平衡。

呂俊甫先生根據花蓮師範學院初等教育系的研究，把台灣國民小學道德科之課程「生活與倫理」的內容作出分析，並考察其評鑑；同時也對國民中學的「公民與道德」科的實施和評鑑加以說明。並指出從這兩科的教育目標可以看出台灣國小及國中的道德公民教育，仍似古聖先賢「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明訓，然而在實施上，仍未能配合政治經濟的發展，德育的目標未易充分實現。

陳建強先生回顧香港自二十年代首次推行「公民科」以迄現在的情況，其間可以看到公民教育在社會壓力下日漸受到重視。陳先生指出，

香港要真正推行公民教育，其政制發展也須「相應地朝向『公民化』及『公民社會』的理想目標」，但由於政府未能釐定政策配合，公民教育的推行在實際上的效果仍未及理想。在回歸的後過渡期中，香港公民教育亦正面對著時代的挑戰。

徐錦堯先生作為一位天主教神父，特別關心在多元社會中，天主教學校如何推行道德及公民教育。徐神父強調天主教固是「屬神」的，但同時也是「屬人」的，推行教育也須重視全人發展，因此天主教學校也是責無旁貸的應負起道德與公民教育的責任。徐神父特別說明「傳福音」與「傳教」之不同，天主教更關注於「傳福音」。傳福音便是要「指向人性的內在轉化和更新」。徐神父預見：「在一個講求宗教自由和重人權的多元化社會中，倫理或道德與公民教育遲早要在天主教或基督教的學校中推行，以代替行之已久的宗教教育。其實這也是傳福音的最有效方法，也是宗教辦學的最佳出路。」

在本書最後的一篇論文中，王智新先生對日本自明治時代以來的道德教育的反覆情況作出了相當詳實的回顧。顯示了保守的國家主義、軍國主義利用道德教育以貫徹國家意志，與受西方影響下重視個人自由自主的革新思潮間的爭持，也說明了日本當前學校道德教育除了道德教育課外，還在中小學開設有如運動會、文娛會、郊遊及各種儀式典禮等的「特別教育活動」以及「學生生活指導」。戰後日本的道德教育雖摒棄了軍國主義，然而改革尚不徹底，一直未能很好地解決傳統與現代化關係的問題。

傳統與現代化關係的問題，事實上是整個東亞共同面對的問題；而當反省到如何推行道德教育、公民教育時，正正會接觸到這問題的核心。對於本書各作者的觀點，讀者可以不盡同意，但相信必可引起更多的深思與反省。

目 錄

前 言	ix
導 言	劉國強 xi
第一部分	
1 新世紀的道德教育——從記號學的觀點看	
道德教育的形式與內容	何秀煌 1
2 動態倫理決策觀下的道德教育	文思慧 23
3 道德教育及其人性論基礎	劉國強 41
第二部分	
4 品德形成實驗研究探賾	章志光 57
5 學齡前後期兒童的道德認知與	
道德情緒的關係	鄭欣宜、程小危 73
第三部分	
6 中國古代道德教育傳統概述	黃 濟 113
7 王龍溪哲學與道德教育	楊祖漢 129
8 儒家道德思想對現代公民教育的啟示	蘇新瑩 141
9 儒家倫理學與德育的重點	黃慧英 157
第四部分	
10 中共理想人格的塑造：	
論「英雄模範」雷鋒	張慧真、盧乃桂 165
11 中國改革開放形勢下價值觀的衝突	
與道德教育	陸有銓 199
12 德育在台灣國民中小學的實踐與評鑑	呂俊甫 215
13 香港公民教育的回顧與前瞻	陳建強 229
14 天主教學校在多元化社會中推行	
道德與公民教育的困局及出路	徐錦堯 249
15 日本的道德教育	王智新 261
編者、作者簡介	279

新世紀的道德教育—從記號學的觀點看道德教育的形式與內容

何秀煌

記號學的觀點

記號學的主要任務在於探討人類的「記號行為」，尋求其演進軌跡、形成和變化規律、累積成效，特別是對人類理性和感性所產生的塑成造型作用。¹對此，作者採取了一些基本的「假設主張」。其中最重要的是「記號人性論」。作者認為今日我們所謂的人性，包括人類的理性和人類的感情，是人類長遠的「記號化」的結果。人類將周圍生態環境中的諸多事物當成「記號」，將自己和他人當成記號，將自己的行為當成記號，將所建所造的器物和建構當成記號。在宇宙之中，天上地下、古往今來的一切事物，一切萬有「萬無」，不論是具體的或是抽象的，不論是存在的或不存在的，原則上都可以被人加以記號化，當成記號。由於廣泛而深遠的記號化的結果，人類的作為當中，佈滿着記號行為。人類的心靈不只進行物理訊息和生理訊息的操作，更不時進行記號的處理和加工。²

記號的特徵是「意義」的外加或賦與。一個給人拿來充當記號的「記號體」，經人賦與意義之後，才成為記號—才成為具有該意義的記號。我們常說一個記號體和其意義之間的關係是一種「俗成關係」

1 我們在此只談論人類記號學，不涉及動物記號學、植物記號學等。

2 物理或生理訊息也常常給轉化成為記號訊息加以處理。

(conventionality)。這就是說，在人類進行記號化之前，一個記號體並沒有具備經過記號化、經過意義賦與之後的意義。所以，人類的記號活動的結果在萬有萬無之外，另外開闢了「記號世界」，拓展了「意義空間」。這是人類迅速擺脫一般動物生態的關鍵。人類在自然生態之外，創造並拓展了他的「文化生態」。人類也在這樣的生態中演化出他的「文化人性」。

在人類的形形色色的記號系統之中，語言(文字、言語以及充當輔助的其他軀體記號)無疑是最明顯可見，最為人所熟知，而且可能對人類文明的演進貢獻最為巨大的記號體系。可是人類的記號行為卻遠遠超乎語言的界限。比如舞蹈裏的「動作」、戲劇中的「面相」、宗教崇拜上的「擺設」或其他有形無形的「建構」、典章制度中的「信符」與「象徵」、感情表達之間的「誓語」或「信物」，甚至一般常生常見的「行為」(包括「食、色，性也」的「吃法」和「性行為」)，以及人生全部的總和或其中的歷程等等，全都可以記號化，全都可以變成記號，全都可以演成「意義空間」裏的元素和項目。我們提議「從記號學的觀點看」道德教育的形式和內容，就是要從人類記號世界的建立以及意義空間的開拓上着眼，討論道德教育的問題。

道德的(小)語言

廣義言之，一切的記號系統都可以名之為「語言」。不過，語言可以區分為種種不同的類別。更重要的是，種種不同的語言往往在不同的層次上運作，擔負很不相同的功能，因此產生不同的內部發展和對外關係。為了正視這類的分際，作者這幾年來提出一種做法：區別大語言和小語言。

粗略地說，所謂「大語言」就是我們一般常用、慣用的日常語言，包括用以輔助並行的軀體記號。這種語言的特色是它的用途廣泛而多樣，因此使用起來靈活而多變。加以每一系統的大語言全都發源於某一文化的背景，並且在該文化的歷史傳統下演變，因此自然地塑造和反映着該文化的基本認知架構、感情取向和價值理想。可是，另一方面也由於大

語言的靈活廣用和植根於某一特定的文化傳統，有時也引起功用上的不夠超然和不夠特定；加以文化之中經常含有小文化（有時不是子文化）和反文化的角逐和競爭、分裂與併合、融會或交錯，所以種種為了比較特定目的而發展衍生的「小語言」也就應運而生，相繼開展。比如，音樂的小語言、數學的小語言、科學的小語言等等就是明顯而為人所熟知的例子。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大語言和小語言雖然各有特長，分顯其能，但卻不一定互相排斥，割裂斷絕。事實上，幾乎所有的小語言（包括藝術上和感情上的「個人語言」）都是在某一大語言的背景和基礎上發展出來的。不僅如此，種種小語言開拓發展之後，往往反過來試圖影響大語言，甚至改造大語言，以便精進人類的認知，加強人類的理性，深化人類的感情等等。簡單地說，種種小語言的開發和拓展往往增益了人類文明，進一步地界定了人性（包括人類理性和人類感情）。³

對於人類來說，道德是（文化）人性的寫照，也是生命藝術的表徵。它是在人性的演化中開展出來的人性特質之一。它不是人類的自然生命狀態必然導致的結果，而是人類有選有擇，可取可棄的品質。人類的道德隨着人性的演化而演化。它不是人類生命的必然結論，而是人性演化的累積成果。這樣的道德演化論顯示着人性的危機，可是另一方面也指出人類的希望。人類的命運操在人類自己的手裏。

追根究底，從記號學的觀點看，道德的起始在於人類跨越了自然生態，創造出記號世界，走入了意義空間。這種記號行為是道德的肇端，也是決定道德形式與道德內容的依據。不同的文化中的記號行為生發出不同或不盡相同的道德。

記號化有深有淺，有廣有狹；它可久可暫，可起可滅，因此形成一種雖然普遍，但卻決非齊一的現象。加以意義空間的開拓並非純粹取決於人類主觀的意願，它也常常受到「客觀情勢」的制約和誘導，甚至受到「逼迫」與「決定」；可是，人類對於客觀形勢的認知卻又不是完全獨立

3 第一，作者在此採取「人性演化論」的假設主張。事實上，記號人性論假定着人性演化論。第二，關於大語言和小語言的關係，以及小語言與人類文明的關係，參見作者的《人性·記號與文明》，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年。

於記號化的活動結果，因此整個道德現象就顯得複雜多端。道德與自然、道德與知識、道德與信仰等等之間的關聯，也變得廣泛而多面。最後，甚麼才算是道德的領域也會模糊乏晰(fuzzy)；甚麼算是「道德語言」更會難以釐定。

在此為了便於討論，我們暫且採取一種比較平實無奇的策略。讓我們採用枚舉例釋的方法。

儘管「道德」這個概念也許乏晰，它和其他文化概念之間，不一定界線清楚分明；儘管「道德」這個語詞或許有歧義，它指謂着不同種別的道德(比如內存的「德性」與外顯的「德行」)，不過我們可以從語用的角度，清理出一些「道德用法」的語言，而將這類的語言統稱為(種種的)「道德的語言」(小語言)。

首先，我們要指出，一個道德語句(語句是一個語言中的基本表意單位)可以出之以陳述的形式，用以表達道德判斷，例如：「誠實是美德」或「濟貧係善行」。它也可以是表願的語句，如：「願天下無惡人」；或勵志的話語，像「日行一善」。當然，道德語句更可出於表情的形式，比如：「為善真樂」；或出於祈使律令的口吻，比方：「要修德，莫墮落」；甚至出於感嘆提問的方式，如：「問蒼天，善人何辜？」等等。

雖然從「語法」的角度看，道德語句的種類紛繁，它與其他種語句不易區分，因此無法依此劃定道德語句的特色；不過，如果我們改從「語意」上和「語用」上去思索，道德語句的特徵也就比較容易呈顯出來。從語意的觀點看，道德語句總是包含着「道德概念」。在現代漢語裏，這些概念數目甚多，比如：「合道德」、「有道德」、「無道德」、「不道德」、「善」、「惡」、「好」、「壞」、「天良」、「良心」、「美好」、「純潔」、「醜陋」、「邪惡」、「貞潔」、「誠實」、「墮落」、「靡爛」等等。這些全都可以在適當的場合裏表達道德意含。當然，在不同的脈絡中，這些概念的道德內涵可深可淺，有濃有淡；使用起來有集中的道德意指，也可以混合其他的功能。重要的是，從語用的觀點看，這類的概念充實了我們的道德記號，構成了道德語言開拓出來的意義空間的實質內容。可是，一樣重要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道德概念的混合功能令道德的意義空間和其他種類的意義空間產生雙向聯繫，發展互動關係。

意義空間的衝突、斷裂與交疊、融合

雖然在一個語言體系中，並非每一個成素全都具有獨立而完整的意義，有些項目甚至沒有甚麼明確的意義可言；⁴可是，就一個語言的整體來看，它的功能來自它所開拓出來的意義空間。大語言如此，小語言也是如此。

就內容而論，大語言的意義空間顯然比小語言的複雜而多樣。有些小語言的意義空間甚至在種種大語言裏，具有其不完整、不明確的通俗版本。事實上，許多小語言的產生往往是因為在原來的語言中(可能是大語言)，意義空間的拓展受阻，因此必須另起爐灶，重新開發。道德的(小)語言亦復如此。

從其大同處着眼，人類一切的記號活動都是心靈活動的產物；一切的記號體系都是精神世界的構作。人類需要超越物相世界，超越感覺世界，進入觀念、概念、心意等理念世界，於是才有記號世界，才跨入意義空間。⁵可是人類的記號世界一經起建，意義世界的發展就如脫韁之馬，奔放難馴。一方面，我們知性的發展不再完全受制於感官的知覺，而進一步走向臆想、假設和理論化的境地。另一方面，對我們現在的討論更加重要的是，人類在情方面和在意方面也不再拘泥於野生的反應和自然的感覺。我們進一步走向生命的自許、人性的寄望和文明的要求。人類的理性、人類的感情以及人類的道德等等，全都在這樣的記號體系及意義空間裏滋生繁衍出來的。

當然，在記號世界裏，有體系內部的發展，也有體系和體系之間的抗爭；有體系自身的割斷分裂，也有體系和體系的兼併融合。因為記號世界裏的衍生和嬗變並非大自然運作的必然結果，因此它的進退演化也沒有一定不可改變的軌跡。事非必然，但卻執着；原可放棄，但卻矜

⁴ 沒有意義的語言元素不一定沒有確切的用法，有時甚至具有重要的用法。

⁵ 記號活動之初起常常離不開物相和感覺，但是記號化一經開始，人類卻可以跨越地由記號生記號。所以，萬有「萬無」皆可為記號體，生成記號，繁衍意義。

持；這是人心的自由，也是人性的價值所在。⁶

專從語言(記號體系)的觀點看，人類追求道德的動機也許複雜多端，但是追求的結果令道德的(小)語言成型發展。當然，從遠古開始，人類已經着手在不同的追求之下，從事不同種類的記號化，開拓不同的語言：感覺的語言、感情的語言、認知的語言、藝術的語言、文學的語言、宗教的語言、政治的語言等等。這些不一而足、種類紛繁的(小)語言，一方面各自有它記號化的語用功能，彼此分開發展；可是另一方面它們也可以分享合用同樣的記號體，製作各自的記號，活躍在各自的意義空間之中。比如認知的語言、感情的語言和道德的語言分別有其各自發展的語用功能和實效目的，可是它們卻都可以收納像「乾淨」、「污穢」等這類的語詞樣型(記號體)，充當自己語言中的語彙，成為自己的記號，具備自己內部的(體系)意義。不僅如此，像人體(body)或人身(person)也可以在上述的各語言裏分別給人加以認知的記號化、感情的記號化和道德的記號化。即使像「食色性也」這類的事(事情和事件)，也可以分別在不同的意義空間裏給人賦與認知上的意義、感情上的意義和道德上的意義，成為認知體系裏的記號、感情體系裏的記號和道德體系裏的記號。因為這緣故，因為不同的語言可以對相同的對象加以不同的記號化，於是各類(小)語言之間的種種互動關係就顯得更加牽連和更加乏晰。比方，當兩種語言互相爭鬥之時，某一概念並非在一個語言中消失，才過渡到另一個語言之內；它可能只是在前者之中淡化或移位，而在後者裏加強或變質。

當道德的語言(小語言)受重視而長足發展起來之後，往往接着滲透到日常語言(大語言)中，豐富其內容，精化其內容，甚至改造其內容，使日常語言的記號體系所經營的意義空間受到衝擊而產生應變。比如，豐富了道德概念，確定了道德意含，釐清了道德說辭，強化了道德論辯的形式和內容。如果發展得淋漓盡致，容易更進一步令該大語言添附極

6 基於此，作者主張「記號人性論」。作者將人類的文明成就(包括人性成就和道德成就)看成人類有情有意、有取有捨的記號化的結果。依此，像孟子所謂的「四端」是記號活動的(部分)結果，而不是它的起因。

多的道德語彙，瀰漫着「泛道德」的內涵。令使用該語言的人難以擺脫道德的意指和道德的計慮。比如，比較起英文來，中文（和日文）就具有極豐富的道德內涵，連說一句話或寫一封信常常都有道德考慮；即使用甚麼字眼來表示「你」和「我」，經常都大費（道德）周章！英文在這方面就輕鬆得多。

除了道德的小語言之外，還有其他種種的小語言也在角逐爭奪，對大語言施加壓力，製造影響，產生效應。比如，傳統上那「為藝術而藝術」或是「文以載道」之間的爭論，表面上看來好似論理立意之爭。可是事實上卻隱藏着道德的小語言在大語言中對其他小語言（藝術的〔小〕語言或文學的〔小〕語言）的侵犯與對抗。這類的現象層出不窮，而且在不同的層面上發生。比如，小至我們禁止兒童語帶「粗話」，大至前幾年日本文部省修改歷史教科書；遠至孔子修《春秋》的一字褒貶，近至中英為香港事務的談判之外的口舌之爭，在在都牽連關係到道德的小語言的問題。

語言一方面是人類行使動用的工具，另一方面卻反過來塑造人類的理性和感性（包括感情）。語言當作工具時，正像許多工具一樣，可能被正常使用，也可能被異常使用；可能被善用，也可能被誤用。比起其他的〔小〕語言，道德的語言算是既鋒利又敏感的工具，若是使用不當，可能反令刀鋒挫鈍，運作失靈。尤其當道德語言和政治語言、宗教語言等結合起來，在大語言中普遍風行，強力進犯之時，很容易由於處理不慎，引起抗拒排斥或抵制反彈。比如，當我們的道德說辭陳義過高，當其（意義空間裏的）概念流於玄虛奧秘或空洞浮泛之時，尤其當這樣的道德語言又藉其他力量強加於人之際，往往反令這樣的道德語言拓展維艱，進退失據；尤其當情況嚴重時，只會令原來已在大語言的意義空間裏所建立的和諧關係緊張衝突，甚至破碎斷裂。有時，在大語言中抗拒泛道德的運動，或進行反道德的清洗，就是這類現象的表現。

所以，在人類開拓經營的意義空間裏，除了穩定的開發拓展，以及常見的生滅交替之外，〔小〕意義空間彼此之間的交疊和融合（比如宗教的和藝術的意義空間的交疊，哲學的和道德的意義空間的融合），尤其是它們在大意義空間裏產生的彼此衝突以及從相對和諧的〔大〕意義空間斷裂分離的現象，更值得我們注視和研討。二十世紀道德語言以及道德意義